

# “传统发展战略”与“替代发展战略”

孙 立 平

“传统发展战略”与“替代发展战略”是在不同时期流行于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发展战略。本文试就两种战略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一些比较分析，以期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战略选择能有所启发。

## 一、两种战略的目标与背景

所谓传统发展战略 (Conven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是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的基本点是把经济增长，具体说，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因此，这种发展战略又常被称为“增长第一战略”。1969年应世界银行的要求所提出的皮尔逊报告和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年）计划，都是传统发展战略的典型例子。

在五十年代末70年代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传统发展战略决不是偶然的。以下的一些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在六十年代之前，目前的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处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当他们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生产率水平低、人民普遍处于贫困状态。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无疑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一般地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相应会带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也会相应带来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独立出来以后，都面临着一个确立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问题。国家实力的增加，无疑有助于确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平等地位。而且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追求的目标，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因为国民生产总值是按国家来计算的，不涉及内部政治派别的斗争。

第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领导人都曾在殖民地和宗主国受过教育，对于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熟悉。而“增长第一”实际上正是西方发达国家长期采用的发展模式。

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一段时间里广泛采用这种发展战略。而且公正地说，按传统发展战略的目标来衡量，在“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期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在整个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5%的指标，但是，到了70年代，这种发展战略开始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批评。从目前来看，传统发展战略的弊病正在逐步暴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传统发展战略几乎不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影响。这种战略是

以资源可以无限制供应的假设为前提的。因此，以这种战略为指导的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比”比较小，造成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甚至浪费。有些经济学家已经指出。美国是以占世界6%的人口，使用世界上40%的能源来达到目前这样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0000多美元），如果发展中国家按现在的经济模式来实现这样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全世界每年资源的消耗量将为现在的六倍。同时，“高投入低产出”的经济模式也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对生态系统的破坏甚至远比发达国家严重，近年来遍及20多个非洲国家的持续性干旱已使上千万人死于饥饿，即是一个明证。

其次，经济的增长并不能自动实现诸如平等、就业等社会目标。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的关系，传统发展战略有三个基本的假设：①增长的果实将间接但迅速地流入到穷人中去，即所谓“间接流下”；②政府的调节将会重新分配增长的果实，从而解决不平等的问题；③不平等是特定增长阶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通过富有阶层的积累，可以提高资本形成率。西蒙·库兹涅茨的“U型曲线说”认为，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初阶段，收入分配会趋于恶化，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分配的状况自然会改善。但从发展中国家实行传统发展战略这一段时间来看，分配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急剧恶化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严重的两极分化，不仅使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惠及全体人民，而且造成频繁的政治动乱。

再次，以传统发展战略为指导的经济增长偏离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正如迪文和利文斯顿在《替代发展战略与适用技术》一书中指出的：“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战略，必然是想方设法去生产象电冰箱、空气调节器、汽车以及豪华住宅一类奢侈品。而这不是穷人最迫切需要的东西。他们最优先考虑的是他们的基本需求，如粮食、衣着和住房。也就是说，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反映穷人最起码的生存需求的满足达到何种程度”。

因此，迪文和利文斯顿说：“人们已经愈来愈认识到，传统发展战略远不是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的有效途径。退一步说，即使这种发展战略最终会给穷人带来好处，也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替代战略”(Altern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应运而生。

在各种替代战略中包括：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就业大会上提出的“基本需求战略”，1975年哈马舍尔德基金会提出的“另一种发展”，“边增长边分配战略”。“公平增长战略”等。也有人认为印度的甘地模式、中国模式、坦桑尼亚和几内亚（比绍）的模式也是替代战略的变种。

尽管目前替代战略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和理论，其政策和途径也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点是一致的。特别是在目标的选择上，各种替代战略几乎异口同声。

替代发展战略追求的目标，不是单纯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强调个人和整个人类的全面发展。换句话说，这种战略的目标不是增长（growth），而是发展（development）。以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来安排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替代发展战略的共同点。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基本需求战略”。与传统发展战略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反，替代发展战略的目标不是单一的。除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之外，还包括消灭贫困、充分就业、公正分配、公民参与等重要的社会目标。这种发展战略认为，这些社会目标不是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以后就会自然实现的，因此必须把它们本身作为目标来加以追求和考虑。同时，替代发展战略也反对传统战略把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对立起来的作法。比如，在传统发展战略看来，经济增长与公正分配就是相矛盾的，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就不得不暂时

牺牲公正的原则。相反,在替代战略看来,平等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只有在一个以平等、大家分享为目标的社会中,才能实现持续的、均衡的增长。他们认为,事实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已经导致了社会的不安定,而社会不安定又阻碍了生产率提高。

## 二、关于农村与农业发展

在对待农村与农业发展问题上,两种战略的立场和主张是迥然不同的。

尽管有些主张传统发展战略的人也倡导农业的发展,如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就认为,要提高资本形成的速度,就必须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因为农业的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粮食来养活工业化所需的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同时也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市场和资金。罗斯托甚至还认为,农业生产量的增长率可能决定着向现代化过渡的极限。但这种战略充其量不过是把农业作为工业化的手段,而在实际政策上,往往忽视农业生产的发展,甚至不惜用牺牲农业来换取工业的发展和按整个社会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

这种战略实施的直接结果,就是“二元结构”的形成。

所谓“二元结构”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城市中的富裕社会(R社会)与农村中的贫穷社会(P社会)同时并存。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是广泛存在的。在城市中,有刚刚从国外引进来的先进的机器和设备,有刚刚竣工的高大的厂房,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立体交叉桥,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有四处闪烁的霓虹灯,这一切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几乎没有差别。拥有和享受这一切的,是占全国人口总数很小一部分的富人,包括官吏、资本家和一些高级专家。相反,广大的农村仍然处于一种非常贫困、落后的状况。土地脊薄,种子、化肥、农药不足,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有的地方不仅温饱问题不能完全解决。而且饮水都相当困难。

传统发展战略有这样一种说法,明智的做法是把精力和资金放在现代化的工业部门,而不是集中于那些小规模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如果这些现代化的工业部门能迅速发展,其好处就能逐步渗透给农村中的贫民。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政府的投资和外援绝大部分流向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农业生产所得份额很少。比如世界银行在25年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总数为250亿美元的贷款中,拨给农业部门的不到10亿美元。

“二元结构”在拉丁美洲表现最为突出。以至有人认为,拉丁美洲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在除南非以外的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在近30年的时间里,拉丁美洲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5%,这不仅超过整个第三世界的平均增长率,而且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4.7%。在拉丁美洲,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但这种经济增长大部分集中在工业部门,而且受益者只是极少数人。而在广大的农村,则完全是另一种情景。在那里,绝大多数人不是没有土地,就是土地少得不足以养活一个小小的家庭。美洲农业委员会曾于1966年对7个国家进行过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在阿根廷有61%的农业家庭属于这种情况。这一数字在巴西是68%,在智利、和哥伦比亚是70%,在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秘鲁是88%。在智利、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和阿根廷,无地雇工占劳动人口的一半以上,在墨西哥、哥伦比亚、牙买加和尼加拉瓜则占45—50%。

而在亚洲和非洲,“二元结构”则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非洲的处于原始状态的农业不仅生产率极为低下,而且近些年又常受天灾之苦。沙漠化在威胁着许多国家,持续的

干早已经造成饿殍遍野。而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使农作物轮作的周期不断缩短，结果造成地力不断下降，就连原来那极为有限的产量也保不住。在亚洲，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洲，生息着世界上半以上的人口。但本来不多且日益减少的耕地，已使许多农村的吃饭问题也难乎为继。虽然从技术上讲，亚洲农业的起步要高于非洲和拉丁美洲，但普遍的贫困化已经造成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巨大阻力。高价的种子、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使农民负债累累，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使用普遍缺乏动力。

替代发展战略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于农村或农业的发展给予充分的重视。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这个赤裸裸的事实：世界的贫困主要是200万个乡村的问题，也就是20亿农村居民的问题。”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也强调了土地改革问题。人们所称的“印度甘地发展战略”明确主张：要把农业列为优先发展部类；确立土地改革体制；增加农村发展预算；改善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贸易关系。这种替代发展战略也影响到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方向。1973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决定把援助的目标集中于农业、农村发展、营养、保健和人口计划、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对于发展中国家农村的发展，各种替代战略都有一个强调的基本点，这就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因为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表明，仅仅靠农民的辛勤劳动并不能解决农村或农业的发展问题，甚至也不能增加粮食产量。事实是，大多数穷人并没有办法得到土地来生产粮食，大部分土地被地主所占有，种植什么作物只能取决于地主的意志。因此，要实现农村的发展，就必须改革土地的地主所有制。

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起自立的自足农业呢？沃勒斯坦在分析了中国、坦桑尼亚、以色列的状况以后提出，这种自足农业的建立需要如下几个条件：

第一，由于剩余农业劳动力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问题，因此必须在农业中尽可能地使用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技术而不是资本密集型技术。

第二，既然连劳动密集型农业也不可能在农村地区为剩余劳动力提供终年的充分就业的可能，那么就应该修建使用劳动力多的“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小型发展工程——修建公路支线、灌溉和其他水道，以及诸如校舍或诊疗所建筑等社会基础设施。应当由就业不足的和季节性失业的农村劳动力来施工，使用当地劳动力建立农村所需的某些基础设施，就业不足的不利条件就可以变为有利条件。

第三，农村地区应该建立只需要少量资本的、使用较多劳动力的小规模轻工业，以补充农业就业机会的不足。

第四，要做到自立，就必须以地方自力更生或自助为基础。简言之，就是说从农村发展中获益的人们必须承担责任来筹集相当部分的资金。因此，自力更生是农村发展的途径。

客观地说，农村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课题。农村中人口的增加和各种条件的恶化使人们对压力日感沉重。替代战略对农村发展的看法，在许多方面也许还不成熟，并且争议颇多，但与传统战略相比，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 三、关于技术发展战略的选择

两种发展战略的分歧也突出表现在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上。

不言而喻的是，无论实行哪种发展战略，都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都要努力在经济和社

会发展当中应用科学技术成果。但是，这两种战略对科学技术的看法、对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是明显不同的。

“增长第一”的传统发展战略往往蕴含着这样一层意思：通过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这样，传统发展战略在科技战略的选择上就往往把“最好的”、“最新的”，“最机械化的”、“最自动化的”高精尖端技术作为引进和发展的重点，认为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就在于缺少这些最先进的技术。因此，要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就要使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这种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反映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就是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近些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都有显著增长。

初看起来，这种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它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民无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但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却被人们忽视了，这就是：这些先进技术是在西方社会那种特定条件下产生和应用的，而引进这些技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条件则与此有很大差别。这样，在引用和使用这些先进技术的过程中，就不可能不产生各种问题。

首先，先进技术的使用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进一步严重。在某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使用就已经造成了“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因为近几十年来人口的剧增已经使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队伍日益庞大，“过度城市化”（即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又使大量的劳动力拥挤在城市中。这样，就使发展中国家的就业不足问题日益严重。本来随着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发展，可以使城市中的部分失业者的就业问题得到解决，但由于这些新发展起来的高技术产业都是资金、技术密集型的，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一直无法吸收劳动大军中增长的那一部分，更不要说吸收农村中成千上万被机械化所取代的那些人了”。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在1977年，大约有3.031百万人，即非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整个劳动力的2/5处于失业或就业不充分状态。其中有4千万人完全失业。更为严重的是劳动力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就业机会扩大的速度。也就是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失业问题不是在减轻而是在尖锐化，这无疑给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火上浇油。

其次，先进技术的引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工业产值的目的，相反，在有的地方已经成为沉重的包袱。先进技术的使用，起码需要两个最直接的条件：一个是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一个是要有必要的基础设施。这两个方面的条件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具备的，但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压迫的历史使发展中国家教育事业十分落后，近年来虽然在发展教育事业上作出了很大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教育事业的发展远不是顺利的。况且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材是一个既需要时间又需要资金的事情。因此，能使用先进机器设备的专门人材的缺乏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同时，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缺乏也使这些先进的技术设备的运转更为困难。由于这些原因，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中，大量用先进技术和机器装备起来的工厂得不到充分利用。

第三，大量引进先进设备，但同时缺少出口创汇能力，使发展中国家债台高筑。不断向上增长的外债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沉重负担。这在拉丁美洲表现更为突出。沉重的外债负担不仅使这些国家难以继续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同时也使国内经济发展呈现停

滞状态。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发展中国家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时所预期的许多美好目标大部分没有实现，而没有预料到的各种问题却是大量出现，使这些国家的政府难以应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替代发展战略提出了诸如“中间技术”，“适用技术”等新的科技发展战略。

新的科技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是基于这样几个事实：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占很大比重；资金缺乏，特别是外汇更为缺乏；一方面人力很富裕，另一方面大部分人没有专门化的技术知识，也没有操作机器的训练或经验。

“适用技术”或“中间技术”则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 所用资金较少。主张“中间技术”的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形象地说，如果以每个工作场所的技术费用作标准，可以象征性地把发展中国家的本地技术称为一英镑的技术，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技术称为一千英镑技术，那么“中间技术”可以形象地称之为“一百英镑技术”。这种技术与本地技术相比，生产率高得多；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相比又便宜得多。

(2) 技术较简单。鉴于发展中国家缺少专门人材和熟练工人，替代发展战略所主张的“适用技术”或“中间技术”一般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掌握。而且所用的设备不很精密，允许人们“粗鲁”地使用，人们也可以边干边学。

(3) 吸收劳动力较多。“适用技术”或“中间技术”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这样，在技术费用限定的情况下，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适用技术”或“中间技术”的使用既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失业问题，也可以通过扩大就业机会来减轻分配上的不平等现象，促进社会公正目标的实现。

(4) 立足本地。这种“适用技术”或“中间技术”往往建立在本地传统技术的基础上，既可以减少发展中国家在资金上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也可以避免受世界市场的影响。同时，这种技术也有助于利用可更新的资源，因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资源和环境的污染。这种技术还可以通过促进自力更生和群众参与而有助于减少各种不平等。

(5) 规模小。“适用技术”和“中间技术”大多都是小型技术，因此只要求最低限度的管理和销售技能，而且市场往往在离本地不远的地方，因而可以适应分散的生产方式。舒马赫认为，这种小型的技术，在防止环境污染方面要比大型技术优越得多。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替代发展战略主张“适用技术”或“中间技术”，并不意味着对先进的大技术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自50年代以来，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大型或高级技术，不能认为这些技术对穷人都是没有益处的。但在使用其中的某些技术时，必须遵循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不应导致或加剧社会不平等；第二，不应产生依赖性，不应妨碍自力更生，因为依赖性剥削的基础。

由此可见，对“适用技术”、“中间技术”与高级的大型技术的不同选择，实际上反映了两种发展战略在技术战略选择上价值的对立。传统发展战略在技术战略选择上的价值观是：技术促进生产。这与它追求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是一致的。替代发展战略的价值观则是：技术不仅应有利于生产，而且还应有利于消灭贫困、充分就业、社会公正等目标的实现，并且不能用牺牲后者的方法来换取前者的实现。后一种价值观也是与人和全面发展的目标相一致的。

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引起了更多的争论。因为“适用技术”也好，“中间技术”也好，

在人们的心目中往往是过时的、二流的、效率不高的技术。有人认为，这是发达国家想把经济和技术冻结起来以维持现状的技术。托夫勒更明确地说，这是一种失败战略，不过是富国设计的使穷国在政治上更软弱，更少找富国麻烦的“急救绷带”。这种战略的结果只能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托夫勒主张，发展中国家要坚决抛弃这种战略，把眼光放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先进的技术上，“站在同一起跑线”，“跃向未来的赛跑”。主张替代发展战略的人对此的回答是：对于任何技术，都要考虑到它在特定社会和文化条件中的生命力。而且，从长远的社会代价和资源成本来看，适用技术往往是最有效率的。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严立贤

---

## 武汉大学哲学系社会学专业简介

武汉大学哲学系社会学专业建立于1986年1月。

1981年，武汉大学哲学系首开社会学课，第二年列为全校选修课。经过3年准备，1984年底在哲学系建立社会学教研室。1985年，校系领导决定以社会学教研室为基础，建立社会学专业，并获国家教委批准。

武汉大学哲学系社会学专业现有专业教员12人，其中副教授2人，讲师3人，助教7人。在助教中，具有本专业研究生学历的6人。专业负责人周运清。1986年秋季，招收第一届本科生35名。根据学校总体规划，1987年计划招生30名，预计1989年计划在校专业本科生150名，专业硕士研究生10名。

目前，社会学专业正致力于师资队伍、教材、图书资料和科研基地等专业基本建设。近年，重点基本理论建设。有：历史、理论和方法。几年之后，将重点向社会管理方面发展，增强社会学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功能。

武汉大学哲学系社会学专业将在近年内建成社会学系。

(周云)